

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作者：宋鲁郑

文章来源 《联合早报网》

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2009-10-05)

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和基础。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也必然体现在制度竞争的结果之上。如果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我们是不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的成功决定了中国再度复兴。

中国在世界范围的落后和挨打，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尽管随后进行了洋务运动，但却惨败于蕞尔小国日本，旧的东亚体系全面崩溃，随后便全面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早已被彻底瓜分（美国二十年代大学课堂上的讨论题目是：是否应该瓜分中国？）。中国之失败显然在于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是制度之败。到现在，这一点应该不会有异议。在美国长期生活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以美国为范本重建中国的制度，并最终于1911年取得成功，终结了晚清七十年的屈辱历史。然而，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间，别说中国再度复兴，甚至连国家统一、主权独立的历史任务都没有完成。更可怕的是，反而沿着1840年以降的下滑轨道加速沉沦：国家进一步分裂、国力进一步衰微。其实民国成立不到半年，民国元老章太炎就公开提出“民国亡国论”，实是振聋发聩、远见卓识。袁世凯称帝固然有其权力私心，但中华民国不适合中国也是其理由之一。张勋复辟固然和他个人对清王朝的愚忠有关，但同样也是中华民国的失败造成的。因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也就是历史的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经走过一个甲子，中国在重新赢得独立和主权之后，也再度崛起成为世界新的强国。不仅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还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到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9.2%，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比欧元区高6.3个百分点，比日本高11.7个百分点，超过世界所有国家。到今天，中国银行业早已超过金融帝国美国，全球十大银行中国位居前三。中国汽车销售量也超过汽车王国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建国时相比，GDP增长了77倍；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增长了一万多倍；贸易总量增长2200多倍，跃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则增加1000多倍；人均GDP在人口增长两倍（从4.5亿到13亿）的情况下，超过3000美元，增长133倍。不仅经济如此，社会发展也是成果惊人。文盲率从80%降至3.6%，人均寿命不足35岁增至73岁。基本医疗将在今年覆盖12亿人口。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45.7%，是全球城镇化速度的两倍。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源于制度成功，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一点，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这样评价一种制度：“国际上的投资，大的资本的投资，人家要选择投资环境，不会选择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国家去投资”。虽然他是在肯定西方的民主制度时说的这番话的，但却是对任何一种制度模式有效的检验标准。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全球五百强（这可是十足的大资本）绝大多数都在中国投资设厂。显然，全球用资本对美国和中国投了赞成票。不过考虑到在中国的投资主体是周期长、流动性差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美国更多是短期、风险性高、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全球对哪一个制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我看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还在于超强的纠错能力。谁都知道中国的决策素来以高效著称，但纠错的能力和效率却往往被人所忽视。新中国六十年，最大的失误有二：一是三年灾荒，二是十年文革。中国纠正这些错误一是时间短，分别为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纠错。这一点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尤其明显。美国独立建国后以立宪的方式实行黑奴制长达百年。废除黑奴制后，又以法律的名义实行种族隔离长达百年。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与终止，也并非自我纠错。黑奴制的结束是通过一场代价极高而且惨烈的内战。北方对南方在战争期间甚至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焦土政策。而种族隔离制度则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和平与暴力的抗争方式才获得的，这期间惨烈的暴动曾震撼全球。

不仅制度上的纠错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就是政策性的纠错能力也是天壤之别。中国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导致人口增长失控。但中国意识到错误后，立即实行计划生育，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虽然也意识到人口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曾尝试计划生育政策，但却屡屡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制度。任何政党想推进计划生育，都会在大选中败北。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口暴涨，并将很快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正如西方所说，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过中国的地方。还有，当中国七十年代末放弃计划经济的时候，同样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印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后，才于九十年代实行市场经济，比中国落后十多年，这在一日千里的地球村时代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美国的次贷危机，几年前就被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机爆发后，他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这样辩解：不错，我是几年前就知道次贷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让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国会会批准吗？一语道出何以失去纠错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国的次贷危机，以“两房”破产为转折点。但两房的问题二十年前就被美国学者（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甚至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两房两大巨头的游说下，在听证会上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后来虽然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权力的委员会根本无法制衡两房。直到2007年，这位学者仍然一再撰文呼吁两房的问题，但最终等来的是危机的全面爆发。

其实西方的制度之所以失去了高效的纠错能力，只有等到危机爆发才有可能解决，原因可从邓小平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1989年，西方资本曾大举撤离，邓小平当时撂下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资本回来了，资本家的政府还回不来吗？”可谓一语道破西方制度的本质。日本京都大学每年都做一个调查：信赖商人的比例为3%，而信赖政治家的比例则为0.3%！美国有一个说谎俱乐部，规定政治家不得参与。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玩玩的，哪比的了政治人物的专业水准。

如果东西方制度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制度至少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这是道德正确色彩浓厚但却弊端丛生。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德国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近几十年历任总统都想将之建立，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奥巴马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势要取得成功，声称为了医改，他宁可放弃连任，他在国会演讲也毫无退路的表示自己将是最后一位医改闯关总统。然而，既得利益者却发起了强大的反扑，把他与斯大林、希特勒并列，并扣上要把美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帽子，现在鹿死谁手仍难预料。至于法国，相同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公投拒绝。而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法草案，他们只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政府不满，而不是对欧盟宪法有不同意见。屡屡在危机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在一次事关改革的公投中败北，而辞去总统职务，彻底离开政坛。当然对于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也从制度上进行修补。比如，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后，法国新政府就不再通过公投进行表决，而是直接在议会表决通过。大家可能注意到，虽然西方号称民主和三权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选举产生，二是采用终身制。原因在于，不是选举产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响和左右。任期终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还是要摆脱民意的制约。尽管有制度上的修补，但当民意走向极端的时候，仍然于事无补。希拉克时代的德维尔潘政府，为解决就业难题，推出CPE法案，以帮助青年人就业（由于法国劳工制度，老板一旦雇用员工将很难辞退。但却造成老板不愿雇人的现象。特别是青年人就业相当困难。为此，该法案决定增加老板的权力。针对青年人雇用前两年可以辞退）。这样一个改革幅度不大、针对面也不广的法案却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议会通过，总统签署已成为法律，但民众却发起大规模长期的罢工、游行。最终迫使这项法律做废。这就是广场政治的效应。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的调整，总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损，但国家要看是否整体上有利。但选民只会看自己。这就是票选民主的致命伤。这就是宁可通用破产，鱼死网破，民众也不会同意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共度难关的原因。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别看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没，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可以产生次贷危机，进而可以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前几年倒闭的全美第十七大安然公司，是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参议员、众议员能源委员会的23名委员中的19人接受过安然的资金。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灭为止。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多夫居然能够在美国可以多年撑起一个五百亿美元的骗局。他自己在监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

资本的力量在中国虽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于政治权力之下，一旦资本逐利本性恶性发展，政治权力可以迅速解决。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尽管企业本身妄图收买媒体和当地政府掩盖真相，但却在最高政治权力面前碰的粉碎。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必将会是第二个“两房”。

中国的现行制度如何，从自身取得的成就，从纵向与满清、民国相比，从横向与西方相比，都可以得出无容置疑的结论。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制度的成功，才创造了中国的复兴这一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后再度复兴的奇迹。

法国巴黎 宋鲁邦

《联合早报网》

(2009-10-10 9:00:00 点击613)

[关闭窗口](#)